

在革命战争年代，由于斗争环境极其严酷，隐姓埋名、易面事敌成为开展隐蔽斗争必不可少的一项手段。翻开波澜壮阔的隐蔽斗争史，无数如雷贯耳的名字，其实都是化名。一个个化名如同水面上的一圈圈涟漪，密纹唱片一般记录下每一个鲜活的生命，或张扬、或沉默，或机智、或壮烈，记录下选择化名时的思绪，或激昂、或稳重、或机敏、或奔放。这是一种特殊的存在，是一种历史的见证，更是一种信仰的力量。



周恩来

从天津卫到上海滩

伍豪，是我党隐蔽战线开创者周恩来的化名，是他在天津领导觉悟社时抽签取数“五号”的谐音。伍豪是周恩来在上海主持中央地下工作时最常用、最有影响的化名。由他编制的我党第一本无线电通讯密码“豪密”，也正是取自该名。1932年2月，寻捕周恩来许久未果的敌特恼羞成怒，干脆在上海的几家报纸上连续刊登《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》文章，企图混淆视听，在我党内制造混乱。隐蔽战线巧妙开展了舆论反制斗争，通过法国律师在《申报》上刊登了《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》，揭穿了敌人污蔑造谣的阴谋，维护了我党领导人的政治人格。而“周少山”一名正是周恩来的另一个化名。另外，周恩来在白区开展革命活动时，还使用过冠生、大美、维思、赵来等化名。



陈云

能文能武的“一介书生”

李介生，是陈云领导隐蔽战线组织中央特科工作时专门使用的化名。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，中共中央决定调整中央特科组织，调陈云担任特科负责人。在特科工作时期，陈云化名“李介生”开展工作。此外，陈云曾使用过怀民、陈亨、陈明、金生、廖仲仁、黄苏、廖家骏、廖陈云等化名。不仅人需要化名作为掩护，机构也有必要。陈云对专业化的掩护机构建设十分重视，他当时建立了“新生印刷所”和“裕大南货店”等一批掩护机构，为以化名开展工作的特科同志们提供了恰当的公开身份和名义，对特科活动起到了很好的掩护作用。

混迹三教九流的“王先生”

王庸，是陈赓在特科工作时的化名。在担任中央特科第二科情报科科长期间，为搜集情报，发展情报网，他化名王庸，置身龙潭虎穴，常与警察、巡捕、包探混在一

『伍豪』『李介生』『王先生』『项南』，他们是谁？

隐蔽斗争史上的特殊存在



项与年

我找我自己的“项南”

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，许多隐蔽战线无名英雄深入虎穴、背井离乡，与亲人失散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踏上寻亲之旅的他们，却因长时间使用化名遭遇了困难。

中央特科的项与年同志，辗转打听到早年在上海失散的儿子也参加了革命，当时可能在安徽团委。于是委托自己的老战友、时任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寻找自己的儿子。曾希圣立即把这一任务交给了负责团工作的项南。由于项与年自特科时期一直使用化名“梁明德”，出于保密他并未向家人透露自己的化名，同时也未向战友透露自己的真名，导致从“梁”姓入手“查无此人”。不想在交谈中，曾希圣发现眼前的项南和自己的老战友梁明德都是福建人，也都曾在上海大世界八仙桥一带住过，地址也都是当年上海地下组织的一处秘密联络点，项南模糊的记忆中一位父亲的“大胡子”朋友还与自己当年的相貌高度吻合。

原来，项南正是自己老战友要找的儿子！他原名项德崇，于1938年秋加入共产党，从事地下工作时也给自己起了一个化名，叫做项南。就这样，两代革命志士在特殊的年代不约而同、坚定不移共赴革命，留下了一段“项南找项南”的佳话。

信仰之名

如果把所有从事隐蔽战线斗争的同志们的化名统统列在纸上，不用刻意连缀，便是一首波澜壮阔的隐蔽斗争史诗。

高山作证，这是忠诚之名；沧溟为鉴，这是信仰之名。



陈赓

起，与敌探特务周旋，在上海的三教九流甚至国民党特务机关里都交了“朋友”，这些人见面时全都亲切地叫他“王先生”或“老王”。

谁是最可信赖的“红色管家”

曾有这样一群人，他们虽然不在战场上横刀立马，却在隐蔽战线上为党的事业赴汤蹈火，熊瑾玎就是其中一员。他为党理财，殚精竭虑，却甘之如饴，是名副其实的“红色管家”。周恩来称其“担任党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，出生入死，贡献甚大，最可信赖”。

熊瑾玎1886年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中医世家，其父为其取名为庆庭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立志于“要做一个有声有色的革命者，像玉石一样可贵”，遂改名为瑾玎。

熊瑾玎1918年加入新民学会，参加了长沙五四运动，他提出“要办事，就要有钱”，主张创办实体。由于办事老成，有经济头脑，他便被推举负责新民学会的筹款工作。

1928年，熊瑾玎转移至上海，被任命为中央秘书处会计科科长，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。当时上海正处于白色恐怖之下，为避免引起怀疑，他和爱人朱端绶以“福兴商号”为掩护，采取“社会化”“家庭化”方式保障中央秘密机关运行，周恩来、李立

三、邓小平等经常来此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。1928年至1931年，在周恩来的指示下，熊瑾玎先后开设了酒庄、钱庄、洋货店、印刷厂、绸缎厂等，这些商铺和工厂不仅为党中央提供了大量的经费支持，还成为了中央领导们开会、接头、传递信息的重要场所，使高度机密的中央枢纽在白区坚守。

1933年，由于叛徒告密，熊瑾玎不幸被捕，任凭敌人如何拷打，他始终坚贞不屈、守口如瓶，直至全面抗战爆发后，才被营救出狱，此时他已被羁押长达几年。

尽管为党理财多年，经手钱财不计其数，熊瑾玎却没有半点积蓄。他用自己的的一生践行着为党工作、对党忠诚的誓言。1940年，熊瑾玎的家人身患重病，10块大洋的就诊费难倒了他，最终家人因缺乏有效医治不幸离世，夫妻为此一直感到痛心。1973年，87岁的熊瑾玎进入生命倒计时，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总理赶往医院看望，此时的熊瑾玎已经说不出话，只通过纸条给周恩来总理留下两句诗：“叹我已辞欢乐地，祝君常保斗争身。”

(均转自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)